第 六 卷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新局面

（1965 年 11 月—1987 年 9 月）

第 一 章

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5 年 11 月—1976 年 10 月）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以保证全军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政治工作，在这十年中，不可避免地贯彻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从而使军队各方面的建设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政治工作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同时，由于我军政治工作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在广大指战员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由于在全国大动乱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在警觉地维护着我国的安全，保持着军队的统一和基本的稳定，使它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正常的工作。由于党内、军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一直在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所有这些，就使军队政治工作在这十年中，既有严重的错误和损失，又有一定的成绩，经验教训是很多的。

本章简要叙述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与部队直接有关的若干重大事件和情况。

第一节　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

（*1965* 年 *11* 月—*1966* 年 *4* 月）

1965 年 11 月，江青、张春桥合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 年 4 月 2 日，戚本禹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吹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批评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海

瑞罢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在江青制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时，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对罗瑞卿进行了所谓揭发批判。罗瑞卿被硬加上“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罪名,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他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请出解放军的“尊神”,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展开更有力的进攻。总政治部派人参加了座谈会。1966年2月，产生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制造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4月8日到6月11日，林彪、江青指令召开的全军创作会议，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对数十部影片加上了“大毒草”“坏戏”等各种罪名进行批判。会议诬称由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代表人物专了军队文化部门的政，并诬陷总政治部一些部门负责同志是军队里“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许多部队文艺工作者戴以“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打击。贯彻和推行《纪要》的结果，整个文艺园地陷入一片死寂。《纪要》成为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舆论准备。

《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推动下，很快从文艺战线扩展为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以至全党全军的“黑线专政论”。由此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十年内乱。

邓小平在1985年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正式宣布"①。

第二节　在全面内战天下大乱中

（*1966* 年 *5* 月—*1969* 年 *4* 月）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通知提出：要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5.16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

总政治部于5月下旬、6月中旬，先后对全军如何贯彻执行中央《5.16通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要求；并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大鸣、大

① 引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5页）。

放、大字报、大辩论 ”(以下简称“ 四大 ”)。部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但是，从 1966 年下半年以来，运动步步升级，秩序日益混乱。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干部战士，普遍担心搞乱社会秩序，影响生产；担心打击面宽了，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担心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也有许多同志担心“ 破四旧 ”破了优秀文化遗产。还有些官兵因亲属被批判斗争,而对“ 文化大革命 ”产生不满情绪。此外，也有人对师以下部队只搞正面教育不理解，认为“ 地方上搞得轰轰烈烈，部队里搞得冷冷清清 ”。一些学员要求开展“ 四大 ”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学校也成立了群众组织，形成了造反派，因而有些系统也对自己的院校派了工作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军队院校“ 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领导，军委领导和总政治部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尽量缩小进行“ 文化大革命 ”的军事院校的范围，撤销了军事院校工作组；要求军事院校的“ 文化大革命 ”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学校去。

8 月 1 日至 12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插话中，再次提出派工作组百分之九十犯了方向性的错误。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 6 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 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所谓“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 左 ” 而实右的错误倾向 ”。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时说：“ 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

8 月 8 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 ”)。“ 十六条 ”提出了文化大革命“ 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重点整党内的“ 走资派 ”。向“ 走资派 ”夺权,要求“ 敢 ”字当头,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10月5日，军委、总政发出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此后，除军以下野战部队外，“文化大革命”就在军队中开展起来，造成了混乱。

军队的“路线斗争教育”随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教育的基本形式就是开展所谓大批判，在批判中学习、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德怀、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与此同时，在林彪指令下，开始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行动。林彪、江青一伙，在总政治部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有一大批干部受专案审查，有些人被迫害致死，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干部被赶出总政。总政治部确实被“砸烂”了。全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受影响受损失了。①

第三节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和“四人帮”被粉碎中

（*1969* 年 *4* 月—*1976* 年 *10* 月）

①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除了列出他们对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瑞卿等人的诬陷、迫害罪行以外，还有如下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企图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受他们的控制。1967年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

“文革”中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大体说来，在“九大”以前，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是以互相勾结为主，勾结中又有矛盾；在“九大”以后，两个集团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的矛盾上升，矛盾中又有勾结。两个集团间争权夺利，又都是为了向党和人民夺取最高的权力。

林彪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的政治野心随着他的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增大而逐步发展，终于走上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道路。“文化大革命”为林彪施行反革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970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则阴谋乘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他的策略是假意推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4 月 11 日，林彪提出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12 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 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5 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他仍然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 月，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7 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叶群于 8 月初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8 月中旬，叶群要陈伯达和黄永胜准备关于称天才的语录。 21 日，叶群在庐山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 月 23 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22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谁就加上。在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一）

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这时，林彪突然在会上发表讲话，是别有用心的。林彪喋喋不休地申明“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且影射攻击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叶群秘密嘱咐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要按照林彪讲话的调子在各组发言，并且串连一些部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言。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另一方面，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小组会上唇枪舌剑，就反映了两个集团之间“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和斗争。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11 月 16 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党全军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 年 3 月 21 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原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原副处长）在上海秘密据点密谋。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法西斯专政。

8 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巡视南方极为疑忌。在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失败后，9 月 13 日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在 256 号飞机强行起飞后，雷达发现 256 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们去吧。14 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使馆的报告：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多，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中国民航 256 号三叉戟飞机坠毁，乘员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从 1973 年 8 月党的十大到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1974 年 1 月,毛泽东批准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中共中央 1974 年第 1 号文件。此后,“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1 月 24 日,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 1974 年第 1 号文件为‘王牌’,周恩来不得不于 1 月 25 日主持了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会上出现,颐指气使,竟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在 1974 年 1、2 月间,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煽风点火。她给国务院文化组、外交组、中央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河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等许多单位写信,鼓动“批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插手军队,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1 月 24 日,她竟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送所谓“批孔”的材料。

江青一伙要在军队“放火烧荒”。派一些人分别到军委总部、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企图把军队搞乱,进而达到篡夺军权的目的。

“四人帮”进行的一系列篡党夺权活动,激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憎恶和愤恨。人们心中长期积累和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在 1976 年的清明节前后,化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抗议运动。

“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是‘四人帮’压制人民悼念周总理。

在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不许人们悼念周总理， 2 月 13 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 高路 ’(即梁效)的《孔丘之忧》,大批‘ 忧 ”字，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污蔑为“ 哭丧妇 ”。3 月 5 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其中全文引用了周恩来为学雷锋的四句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时却把题词全部砍掉了。这更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3 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学生和市民举行悼念周总理、反对“ 四人帮 ”的游行集会，贴出“ 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 ”“ 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一张春桥 ’等大幅标语。3 月底至 4 月初，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数十万群众包括部队的干部战士云集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表达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愤恨“ 四人帮 ”。3 月 30 日，第二炮兵后勤部 24 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群众以解放军官兵在反对“ 四人帮 ”的重要时刻，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而欢欣鼓舞。一个署名“ 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 ”的诗篇，指斥“ 四人帮 ”的反动行径：“2 月 6 日《参考消息》，公然刊登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文章，为什么？3 月 5 日《文汇报》在转载纪念雷锋活动的文章中，唯独删去周总理的题词，为什么？革命不怕压，怕压不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誓死不屈。谁反对周总理，就和他拼到底 !”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抗议活动。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它预示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末日即将来临。

9 月 9 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以后，“ 四人帮 ”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布置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

他个人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指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为江青上台大造舆论。江青等人还四出游说，秘密串连，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更为严重的是：“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赫然写在 16 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此后反复加以宣传。“四人帮”伪造并大肆宣传“临终嘱咐”，是要争夺毛泽东这面旗帜，标榜他们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并以此打击华国锋和其他领导人。

党和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与他研究，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7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10 月 8 日至 15 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14 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粉碎“四人帮”，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非常热烈的拥护。从 10 月 21 日到 30 日，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庆胜利。10 月 24 日，首都 100 万军民举行集会，庆祝胜利。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十年“文革”的历史教训。《决议》指出：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林彪、江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还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第 二 章

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1965 年 11 月—1976 年 10 月）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错误的‘政治大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也有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行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保持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成绩。

第一节 学习毛泽东著作被引入歧途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引入歧途，别有用心地宣扬个人崇拜，败坏了正确的学风， 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利用群众“造反”,达到反革命集团个人的和反动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1966 年 5 月以后，林彪再三再四地发表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8 月 21 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四个伟大”，即“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9 月 18 日,他说“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1966 年 12 月 10 日，林彪提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1967 年 3 月 24 日，林彪把空军司令吴法宪提出的“三忠于”纳入自己讲话之中，并逐渐发展为“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1967 年 5 月，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要“更加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指示，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解放军报》发表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社论。社论指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课堂。这场革命的大风暴，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深地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对每个干部战士都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考试过硬一万倍。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与文化大革命实践相联系，适应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变化、新需要，把历史巨轮推向前进。并号召全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露走资派的罪行，粉碎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大毒草”《修养》(按 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有些单位，在宣传个人崇拜上更是互相攀比，一个比一个调门高。例如：空军的吴法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事事照办，时时照办，处处照办；自己照办，发动群众照办；老老实实地照办，雷厉风行地照办。”“毛主席的话，一千万个对，一万万个对。”强调传达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不过夜”。哪怕是夜半三更，只要接到毛泽东或林彪的指示，都要立

即传达、学习。甚至经常在接到最新指示之前，就已接到电报或电话预告，各级人员都坐在电话机或收音机旁等着，宣传干部分别下到功臣单位和功臣处等着，一接到最新指示，就马上座谈讨论，敲锣打鼓，报喜贺喜。领导的表态，功臣模范的学习体会，都迅即传到北京，争取见诸报纸和电台。

多数部队无论是在京华重地、边防哨所、出海舰艇，每天早晨，都要朝着北京方向或太阳升起之处，高唱《东方红》，“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集体或个人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表示一天工作的计划和实现决心，及实现要求，此谓之“早请示”。晚上熄灯前，分别以连排或班为单位，将上述步骤重演一遍，然后总结一天工作，汇报优缺点，表示改进的决心，此谓之“晚汇报”。凡是集合，不论是上课、开饭、集会，都要在连队自己用泥木砖石等各种材料建造的小“天安门”前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挥舞《毛主席语录》祝颂毛泽东和林彪。此外，有的部队编了忠字舞，语录操。营房、阵地、哨所、仓库，凡是能粘贴东西的地方，都或挂或画或喷涂或用石子嵌上毛泽东头像、语录、太阳、葵花等各种表忠心的图案和‘忠’‘公’二字，从而造成‘忠字化’的海洋。

11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12月17日，毛泽东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1970年7月，《解放军报》转发了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总结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七字经”，即“看、想、问、忆、用、写、查”，其基本内容是：

看：就是认真地带着问题学。采取自己找、群众评、领导集中的三结合方法，找出阻碍自己继续革命的要害问题，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地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教导。

想：就是“多思”。以毛主席教导为武器，把自己摆进去，多问几个“为什么”,想想应该怎么办。

问：就是向领导和同志请教，带着理解不深、解决不了的问题，登门取经，虚心求教，解决自己思想革命化中的疑难问题。

议：就是大家一起议论。通过议论会、辩论会、谈心活动等方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互相争论，活跃学习空气，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提高革命自觉性。

用：就是实践。学一点，用一点，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是‘七字经’的核心。七个字不能并列；‘用’字最重要。

写：就是把学习和运用中最主要的体会更加深刻、更有条理地写出来，能写多少写多少。

查：就是总结提高。通过个人讲用、群众评论、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反复学习，反复应用。

概括起来，就是反复看、认真想、不懂问、互相议、狠狠用、重点写、不断查。并认为‘七字经’是‘三忠于’崇高品质的结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

1971 年 3 月，《解放军报》发表了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六步做法”，即：第一步，带准问题：紧跟形势和任务，带思想革命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力求一个“准”字。第二步，认真读书：从毛主席著作中选出针对性强的观点，深刻领会，力求一个“深”字。第三步，斗私批修：斗私心肃‘刘毒’，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并防止无限上纲，突出一个“斗”字。第四步，落实行动：认真实践，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立竿见影，狠抓一个“用”字。第五步，讲用评议：个人讲用，大家评议，互相交流，议要害，评根本，着重一个‘实’字。第六步，总结提高：小结学习经验，典型讲用，表扬好人好事，对比先进找差距，解决一个“促”字。“六步

做法”的原则：一是从抓感情入手，提高学习自觉性。即从阶级教育入手，深刻认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由此提高学习自觉性。反复领会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的教导，认识在阶级斗争中只有狠抓“斗”字，才能红根红苗红到底，从而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二是为‘用’而学，在‘用’中学。树立为紧跟照办而学、为紧跟照办而用的观念，设定问题，对号入座，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为“用”得好而刻苦读书。三是群众互学互助，自己教育自己。学习在前，帮人在后，学中有帮、帮中有学；以个人自觉斗为主，群众促为辅；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是干部在运用中带头，在带头中引导。

总之，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引入歧途，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大发展。

第二节 “三支两军”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操纵下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从此，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各地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组织都要夺权，使得本来就很混乱的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全国陷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状态。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相继瘫痪或半瘫痪。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基本被“砸烂”，许多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这一局面，直接威胁着国计民生，同时也存在使“毛主席战略部署”落空的危险。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指令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①任务。这一决策，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1 月 21 日，南京军区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

① “三支”：支左、支农、支工。“两军”：军管、军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